

從翻譯到文化：張南峰教授訪談錄

主訪人：單德興

時間：2015年11月19日

地點：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



圖1 張南峰教授（左）與單德興特聘研究員於嶺南大學翻譯系合影。
資料來源：單德興教授。

收件：2016年8月3日；接受：2016年12月16日

前言

張南峰 (Nam Fung Chang) 教授專研翻譯研究，相繼取得香港大學學士與碩士學位，以及英國華威大學 (University of Warwick) 博士學位，為那一代少數科班出身的翻譯研究學者。他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 (1994 年升格為香港城市大學) 任教七年後，轉往嶺南大學翻譯系，現為該系教授，講授翻譯理論、翻譯與幽默等課程，教學有方，深受學生愛戴，曾獲得教學獎。

除了教學之外，張教授在翻譯理論與實務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現，為唯一四度獲得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紀念獎 (Stephen C. Soong Translation Studies Memorial Awards) 的學者。他對多元系統論 (Polysystem Theory) 著力尤深，著有專書《多元系統翻譯研究——理論、實踐與回應》(2012) 以及多篇中、英文論文，以闡揚該理論聞名國際。他對於當代中國翻譯理論與批評也多所針砭，曾有「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譯學」之說，引發熱烈討論。

就翻譯實務而言，張教授的譯作集中於英翻中，早年翻譯的《日月精忠》(Robert Bolt 原作，*A Man for All Seasons*, 1985 譯，臺灣的電影譯名為《良相佐國》) 曾由香港話劇團演出。他尤其喜歡翻譯難度高的幽默文學，譯有《王爾德喜劇選》(*A Collection of Oscar Wilde's Comedies*, 1990 譯) 與《好的，首相》(Jonathan Lynn 和 Antony Jay 原作，*Yes Prime Minister*, 1993 譯)。並撰寫專書 *Yes Prime Manipulator: How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ritish Political Humour Came into Being* (《好的首席操控者：如何產生一部英國政治幽默中譯本》，2005)，運用多種翻譯理論，自剖翻譯《好的，首相》的過程、特色與意義。

張教授與陳德鴻編譯的《西方翻譯理論精選》(*Masterpieces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2000)，在華文世界影響深遠，獨力撰寫的《中西譯學批評》(2004) 也頗受好評。由於他嫻熟翻譯理論，曾為香港與

臺灣的代表性學術刊物編輯專號，如香港《翻譯季刊》的「中國翻譯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專號」（2000）與「翻譯與意識形態專號」（2000），以及臺灣《中外文學》的「多元系統研究專輯」（與莊柔玉〔Yau Yuk Chong〕合編，2001）。

主訪人利用在嶺南大學翻譯系訪問研究之便，與張教授進行訪談，事先整理出四頁的訪談大要供他參考，內容相當廣泛，除了個人具傳奇性的成長背景之外，也涉及學思歷程、翻譯研究、翻譯教學、香港翻譯界、港臺翻譯學者的互動等議題。錄音檔由趙克文小姐謄打，黃碧儀小姐初步修潤，主訪者增訂，並經張教授本人確認，謹此致謝。

訪談

單德興（以下簡稱「單」）：幾年前網路上流傳你的一篇文章〈我的中港心〉，引發很多迴響，從中可以看到你一生中的傳奇性以及個人的獨立性。請你談談自己的家庭背景與後來從事學術的關係。

張南峰（以下簡稱「張」）：我父母是左派的知識分子，在三十、四十年代都比較親共產黨。父親坐過國民黨的牢，被國民黨通緝，四處流落，四十年代成為香港的新聞工作者。後來廣州「解放」，他們回廣州參加革命，而我就在廣州出生。兩年後我父母又被中國政府派到香港來，在左派傳媒工作，所以我的家庭背景都在左派的圈子裡。我小學畢業就回大陸去，念了兩年中學，碰上文化大革命，之後就上山下鄉，在鄉下待了五年。

單：你在《多元系統翻譯研究》的〈後記〉提到，你在文革時當了「兩年工人，三年赤腳醫生」。

張：是的，後來我又回到香港，當時二十一歲，在《大公報》做了六年校對，就在那段時間重新念夜中學，然後考大學。

單：在大陸下鄉五年，來香港之後在教育銜接上有沒有困難？

張：我在大陸念了中學二年級，到香港重新從中二開始，英文特別

難，要自己學，那時候跟不上，所以幾乎把全副精力都放在學英文，很多年都是這樣。

單：用什麼方法趕上？

張：死記硬背！看書！

單：怎麼個死記硬背法？特別看什麼書？

張：我一來香港就買了 *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與偏見》）與 *Romeo and Juliet*（《羅密歐與茱麗葉》），還看不懂就先買了，兩年後開始看 *Pride and Prejudice*，中英對照著看。還看了很多其他的英文書籍，包括英文版的《毛主席語錄》，不懂的字全抄下來，抄了可能有幾千個，有時間就拿出來背，背了很多年，到大學二年級才不背這些英文單字。

單：你大學是唸什麼系？

張：香港大學中文系，當時的翻譯課程是在中文系，用的是很傳統的翻譯教學方法與翻譯評論。只有一位老師教翻譯理論，像奈達（Eugene A. Nida）之類的，但不考試。

單：是哪個國籍的老師？

張：是中國籍的張曼儀老師，老早就退休了。

單：碩士班呢？

張：還是在港大，還是沒怎麼學理論，主要還是傳統的翻譯批評。我的碩士論文探討王爾德（Oscar Wilde）戲劇的翻譯，基本上都是評價式的。

單：你在大學本科時就已經把王爾德的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認真為上》）譯出來了。

張：那是在 1982 至 1983 年、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因為畢業時都要做一篇長篇翻譯。

單：你怎麼會選擇王爾德的呢？是因為他那些喜劇的文字遊戲具有挑戰性？

張：我就是喜歡這個，這其實來自兩個影響，近的影響就是二年級時看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的中譯，就是趙元任的譯本《阿麗思

漫遊奇境記》，翻譯課上的翻譯批評就包括這個，覺得趙元任的雙關語都很有趣，做得很好，心想他能做我也能做！還有一個很遠的影響就是小學時看過一個翻譯的作品，裡邊有些雙關語，但譯出來的一定不是原文，而是譯者自己創造出來的。

單：還記得是哪個作品嗎？

張：忘了，只記得是大陸的刊物，故事是老闆要去一個員工家裡吃飯，那個老闆有個酒糟鼻，因此員工不能看他的鼻子，只能看他的額頭或下巴。員工千叮萬囑地叫他老婆千萬別看老闆的鼻子，結果老婆戰戰兢兢地招待老闆吃了一頓飯，由於太緊張了，在給他倒茶時就說：「要往你鼻子裡倒多少茶？」故事就結束了。我忘了是從什麼語文翻成中文的，外國語的「鼻子」跟「杯子」的發音大概不會那麼相近，想必是譯者自己創作的，而且中文的邏輯並不通，沒有人會這麼問的。總之，很精彩，我一直記得這些例子。

單：後來你的《王爾德喜劇選》（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翻譯出來，好像編輯跟你的翻譯理念不太合，在出版上遭遇了一些困難？

張：他們找了一位退休的英文教授來審核我的譯文，說是錯漏百出，好比雙關語，他們覺得我譯錯了，但我的翻譯本來就不是跟著原文走的！

單：你有說明嗎？

張：我跟他有些爭論，最終書還是出版了，可是他們有點賭氣，就不替我校對，所以排錯了很多字，而且他們胡改。把我那些「不正常」的文字都改成「正常」了，好比「此地有銀三百兩」被改回「此地無銀三百兩」，他們不知道我的用意。所以後來出版的譯本品質很差。

單：我在臺灣借到的版本滿厚的，在嶺南大學圖書館借到的比較薄一點。

張：是不是同一個譯本？

單：我沒機會比對。你既有翻譯理論，也有實踐，而且現在是個知



圖2 張南峰教授譯作《王爾德喜劇選》及《好的，首相》。

資料來源：單德興教授。

名的翻譯學學者與理論家，更有「本錢」跟出版社商量，出個忠實於自己原來譯文的版本。

張：退休後再做吧！我現在比較少考慮翻譯的實務，而是關注於理論，還有文化。

單：你出版的五本書中，前兩本是翻譯，後三本是理論。

張：在某種程度上是被迫的，必須從事學術研究……

單：除了《王爾德喜劇選》之外，你的另一本翻譯《好的，首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3）也是充滿幽默和文字遊戲。當初有沒有特別想過要加註解？

張：其實我還是加了不少腳註，不過我想腳註只是額外的，提供一點背景資料，不要求讀者看腳註去理解，而且沒有腳註的話也能上演，我就用這個為標準。

單：提到上演，你翻譯的《日月精忠》（1985）曾在香港上演。能不能請你談談戲劇翻譯的特色？

張：戲劇翻譯有兩種，一種是譯出來直接就可以上演，另一種就是提供演員一個閱讀本，讓他們去發揮。我在學校念書時，做長篇翻譯的導師就是劇團的演員跟翻譯。

單：是哪一位？

張：黎翠珍。

單：就是現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教授？

張：是的。她教我的那一套就是要譯出來的東西能夠直接在舞台上講出來。至於另一派就是故意翻成不是很口語化，跟演出的版本一定會距離，然後讓演員自己去發揮。我翻《日月精忠》是和導演合作的，我第一稿全翻成廣東口語，他不滿意，對我說，你的廣東話一定不如那些演員，不如就用書面語來翻，讓他們去發揮。結果譯出來的東西我自己不喜歡！

單：是哪位導演？

張：陳載澧，香港大學數學系的教授。我們的觀點不太一致，比方說，英國貴族聊天，聊到某某人曾經從馬上摔下來，跌傷了屁股之類的，我就用廣東俚語「八月十五」來翻譯「屁股」，但導演就說這個說法太俗，你就寫「臀部」，讓演員自己決定怎麼講。他這麼說，我就覺得沒意思，因為你找個電腦之類的機器都可以翻出來。

單：《日月精忠》是有關摩爾（Sir Thomas More, 1478-1535）的故事嗎？

張：是的。這個譯名是香港的電視台用過的。

單：臺灣翻成《良相佐國》。那齣戲演出時你有去看嗎？感覺如何？

張：去看了，演得很好，演員演技不錯，台詞改得也不錯。

單：你翻譯的王爾德上演過嗎？

張：沒有，沒有機會，給余光中搶先了！

單：翻譯王爾德的挑戰非常之大！你提到唸碩士的時候討論王爾德，是有關哪一方面？

張：是討論別人翻譯的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和 *Lady Windermere's Fan*。

單：那時余光中的譯本還沒出？

張：已經出了。

單：你有討論到他嗎？

張：有。

單：但不在你的著作目錄中。

張：我的碩士論文沒有出版，因為是我覺得慚愧的東西，其中沒有什麼理論。後來我喜歡上理論之後，就覺得自己以前寫的東西都沒用。

單：你的第二本譯書《好的，首相》前後花了五年，書前還特別附了翻譯合約內容：“The translation...shall be made faithfully and accurately and additions, abbreviations or alterations may be made only on condition that the artistic and/or stylistic qualities of the Work are preserved as far as possible.”（「……譯文必須忠實、準確，只在盡量保留原著的藝術、風格特質的前提下，方可作出增刪改動。」）為什麼你會特別把這段中英文放在書前？

張：這是一個 declaration，宣告我的翻譯態度，因為八十年代那時香港有一場辯論，就是翻譯到底要不要忠實？

單：雙方各有什麼人？

張：主張翻譯不要太忠實的是周兆祥，他 1983 年在中文大學開始教翻譯。他是香港第一個拿到翻譯研究博士學位的人，是在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拿的，回來之後寫了很多文章，主張翻譯要做手腳，遭到很多人圍攻，因為老前輩們沒聽過這樣的話。那時我還不是個人物，可是就比較喜歡他那些主張，所以我自己做翻譯會故意挑起這個話題來討論。

單：那時你還在研究生階段？

張：已經畢業了，在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教翻譯。

單：你是碩士畢業後教了一段時間的翻譯後再出國，取得華威大學博士學位？

張：其實我並沒有出國，而是以兼讀的方式取得博士學位。

單：你為什麼會選擇翻譯《好的，首相》？

張：也是因為雙關語的緣故，而且其中的政治遊戲讓我想起大陸的很多情況，產生共鳴。那本書裡有兩百來個雙關語，看了很開心！

單：後面有提到書中的雙關語有八成都翻譯出來了。雙關語是翻譯中非常大的挑戰，你為什麼特別對這感興趣？

張：就是有挑戰才好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長處、短處，如果要我翻莎士比亞這類的我還不懂，我喜歡通俗的那種語言。

單：你先前翻譯王爾德時，對自己的翻譯策略並沒有特別著墨，但是翻譯《好的，首相》時，除了書末的〈附錄〉對自己的翻譯策略有所說明之外，後來還寫過中文論文、英文論文、甚至英文專書 *Yes Prime Manipulator*，前後四度現身說法。為什麼你覺得有這種 necessity（必要）、甚至 anxiety（焦慮），以致要自當解人？

張：就是因為剛才講的香港那場論爭，其實大陸也有，可能臺灣也有，也就是有關翻譯標準的爭論。當初的主流意見，起碼香港和大陸的主流意見是很講究忠於原文的，其實臺灣也一樣。記得 1992 年在珠海開「海峽兩岸外國文學翻譯研討會」，大陸、臺灣、香港的學者都與會，余光中、金聖華也都去了。我在那個會議上發表論文，主張原文不是一切，引起了一些爭論。其實我就是愛爭論的人，而且自己感到是少數派，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這樣想的，所以就藉這樣的機會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單：你剛才提到香港的第一次論爭，哪一方氣勢比較強？

張：周兆祥是孤軍作戰，基本上沒有人支持，他被老前輩們批評得很厲害。這個論爭被載入了史冊，大陸出版的《中國譯學理論史稿》就提到當時香港翻譯學會會長劉靖之對翻譯理論的貢獻，就是批評了翻譯可以不忠實這個觀點。

單：後來隨著翻譯學逐漸興起，你提到的「原文不是一切」這個觀點是不是愈來愈多人接受？

張：那已經是九十年代末期的事。〈原文不是一切〉那篇文章一直沒能登出來。那個時候我受到翻譯理論的影響，但還沒深入研究。後來

比較認真閱讀翻譯理論之後，像西方的目的論（Skopos Theory）和多元系統論，就開始走上理論研究的道路。這些理論在 2000 年前後就成了主流了。

單：雖然翻譯理論有學理上的興趣和吸引力，但是如果有人用特定一套理論翻譯出一本書，會不會在出版社或市場遇到比較大的阻力？尤其是因為編輯、出版社和市場都還維持著傳統的觀念。

張：這是很可能的！我翻《好的，首相》是有些因素。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詹德隆很同情我的這種翻譯。我這本書本來想在大陸出的，也有出版社接受了，但八九年之後不敢出了，負責的編輯說：「你也知道，共產黨整起人來很厲害的。」我就跟詹德隆說我遇到這樣的問題，想在你們這邊出書行不行？他很喜歡英國的東西，也同情我的遭遇，馬上就答應了。

單：這本書是你自己找的？

張：自己找到的。

單：怎麼會碰巧遇到這本書？

張：其實是胡亂看到的。我看到大減價的書，這麼厚，拿起來一看，很精采！後來香港的電視台也播了電視劇。其實是先有電視劇，後來才出書的。

單：是 BBC（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嗎？

張：是的。這個電視節目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很受歡迎。演首相的那位演員被好幾個國家的元首、總理當成真的首相。他去法國時，法國總統接他去總統府會談。後來印度和 BBC 合作重拍了這個電視劇，改以印度為背景。英國的政治家都很愛看。當時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公務員也很喜歡看。大陸曾經預告要播，八九年就沒有下文了。到了九一年，文化部副部長英若誠剛下台，就把 *Yes Minister* 其中一集搬上舞台，用英文演出。

單：是他自己粉墨登場嗎？

張：是啊！他自己演部長。*Yes Prime Minister* 是 *Yes Minister* 的續集。

單：你翻譯這部作品之後，還用上三篇文章和一本專書，以理論的方式來支持自己的實踐。

張：當時主要還是受奈達的影響，因為還沒接觸到多元系統論，所以我講的就是 dynamic equivalence（動態對等）這類的觀念。

單：能不能談談你從動態對等到目的論，甚至一路到多元系統論的歷程？

張：我覺得奈達的理論比中國傳統的理论開放，比較讀者取向，強調要令讀者欣賞，對受傳統翻譯思想影響的人來說是一種解放，所以當時我特別喜歡奈達的理論。後來再進一步看到目的論，比奈達更加 liberating（解放）。可是這些理論在華人世界受到很多抗拒。

單：所以你是有了翻譯實踐之後，再用理論來支撐。

張：多元系統論到圖理（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譯學（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跟中國傳統翻譯理論更不同，因為他們的理論在翻譯標準的問題上是客觀中立的。這種學術觀念在華人世界裡從來沒聽說過，所以是非常反中國文化傳統的。可以說，目的論和多元系統論，在香港和大陸我是第一個引進的。臺灣可能比我早，但是香港當時跟臺灣沒有很多來往。

單：我記得伊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曾訪問過臺灣。雖然許多人知道他的多元系統論，但沒有人像你這樣專注於這個理論。

張：張錦忠曾說要翻譯他全部的著作，後來沒有下文，很可惜。¹

單：所以我就好奇，你為什麼這麼多年堅持多元系統論？多年來你發表了很多篇相關的中文和英文論文，雖然你發現原來的理論有需要加

¹ 伊文—佐哈應臺灣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之邀，1994年11月以國科會邀請講席名義訪臺，於臺灣大學外文系發表兩場演講：“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s of Europe”與“Culture Planning and the Market: Making and Maintaining Socio-Semiotic Entities”。當時張錦忠撰寫中的博士論文以「複系統理論」（即「多元系統論」另譯）為理論架構，得以當面請益，對方並表示張可翻譯他的作品。馬耀民主編《中外文學》時，張錦忠協助策劃專號，包括邀請張南峰編輯多元系統論專號。2000年夏，張錦忠帶領遊學團參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與張南峰在該市華人餐廳餐敘，討論專號事宜，相談甚歡，次年夏天專號出版（《中外文學》30卷3期〔2001年8月〕）（感謝張錦忠博士提供相關資訊）。

強之處，但也一直為它辯護，甚至國際上翻譯研究的專書還特別邀請你寫有關這個理論的專文，儼然你不只在中文世界、而且在國際上是多元系統論的主要辯護者與捍衛者。

張：這很奇怪，本來不該由我做的，該由他們以色列的學者自己做。可是他們從來不跟人辯論，我在旁邊有點打抱不平。的確，我看到一些西方影響力很大的學者，主要是甘澤樂（Edwin Gentzler）和何曼思（Theo Hermans），還有我的博士導師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對多元系統論的批評其實是基於一些片面的了解。他們只看了伊文—佐哈的少數文章，然後就抓住其中某些段落或幾個字加以批評，所以我覺得有需要反駁這些批評。這個理論給了我很多靈感，起碼在中華文化的語境下，讓我看到華人世界翻譯現象的某些問題，這是前人所看不到的。一直到目前我還覺得這個理論能指引我發現一些新的東西，看到一些新的觀點，我一直覺得很有用。有些人說它已經過時了，那為什麼我看到的這些問題，別人看不到呢？這就證明這個理論還是有用的！

單：這個理論就我個人的了解，尤其是在讀過你對伊文—佐哈的理論的闡釋，就是翻譯不只是文本本身，更牽涉到更大的文化，甚至文化裡面不同系統之間的關係。

張：好比說最近大陸很關心的問題就是中國文學走出去。很多人就停留在應該怎麼翻、應該由誰來翻這樣的技術層面。我從多元系統論的觀點就可以把問題看得更大，指出這不是技巧和實際操作的問題，而是整個文化的自我形象（auto-image）太高，急於求成，才導致事倍功半的結果。伊文—佐哈不一定講過自我形象的問題，但從他的理論可以推演下去。他的理論作為一個起點，讓我把問題愈看愈大。

單：如果說中文外譯有這種自我形象的問題，那你認為要如何處理才便於他們把中文作品翻譯成外文？

張：其實我從你的研究裡得到一些靈感。你和宋子江都講到美國新聞處推動的美國文學中譯，他們採取的是一個比較開明的作法，讓 target culture（目標文化）的人放手去做，甚至讓你自己選原文。宋子

江講的那些，我之前也沒聽說過，竟然放手讓左派的譯者來選擇文本，跟中國現在的作法完全不同。中國則要有決定權，翻什麼東西，用甚麼方法去翻，全都要自己主導，不讓外人去做！這種態度背後的原因就是文化自我形象太高，連美國都比下去了！

單：中文外譯裡兩位重要的翻譯家就是楊憲益跟他的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一個中國人、一個英國人，而且是在政府支持下從事翻譯，其中自然有意識形態的考量，然而畢竟熊貓叢書翻譯了很多文學作品，現在的作法跟當時的作法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張：我在近期一篇論文中提到，楊憲益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翻譯策略有所變化，愈來愈走向忠實於原文的方向（source-oriented）。到了八十、九十年代由其他人做的時候，更加以原文為導向。原先在四十、五十年代採取的是比較歸化（domesticating）的方向。那麼將近半個世紀以來為什麼會走向異化的道路，我認為是因為中國自我形象愈來愈高的原因。

單：上次羅選民來這裡演講時，談的主題就是文化自覺（cultural awareness）。²

張：是的，不過他在那個環境裡，話不能講得太白。

單：而你自己的一些表達方式，像是「中國沒有純翻譯理論」，或是1995年的文章〈走出死胡同 建立翻譯學〉，在大陸就激起一些比較激烈的反應。

張：挑起一個辯論！

單：那時的背景如何？

張：當時我還是個小人物，不過香港學者的身分就可能引起一些關注。那篇文章先是投給《中國翻譯》，但半年多了都沒答覆，於是我就跟《中國翻譯》說，我決定撤回，改投《外國語》。後來香港翻譯學會派人去參加中國譯協的全國會議，空了一個位置，就叫我去，我一去參

² 北京清華大學羅選民2014年11月12日於嶺南大學翻譯系演講〈文化自覺與典籍英譯〉。

加那個會議，《中國翻譯》的編輯就說我的文章已經付印。結果我這篇文章同時在兩個期刊登了出來。我也想不到這篇文章會引起這麼多的反應。

單：那種說法會不會讓大陸譯壇覺得自我形象、文化自尊有些受傷？

張：不會，因為翻譯理論界比較能接受外來的東西。

單：背後的原因如何？

張：這涉及文化態度的問題。整體而言，在九十年代初，中國文化的自我形象可能由於六四事件的影響而似乎處於一個小低潮，譯論界則需要借助新理論來建立翻譯學。我記得剛去大陸發表、傳播這些西方理論的時候也有壓力，一些老前輩、比較有影響力的教授都比較抗拒。但大部份中青年學者，還有一些老人家，就比較 receptive（接納），好比說劉重德，他當時是英漢語比較研究會會長、大陸翻譯界元老，在珠海的會議上批判嚴復的「信、達、雅」之說，指出應該是「信、達、切」，因為白話文一樣能傳達原文。接著我發言就提出異議，指出嚴復要面對他的讀者，而他的讀者是不接受白話文的。他就坐在我旁邊，他的反應是很驚訝，但沒有生氣，反而表示欣賞。他就是這種開明的老人家。逐漸就愈來愈多人接受西方的翻譯理論。在那段時期，有人主張建立「中國翻譯學」或者「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的說法，但是這種民族主義思潮很快就被壓倒了。

單：你提到「信、達、切」時，我馬上就聯想到思果主張的「信、達、貼」，那是比較老一輩的人，作法和觀念比較守舊。但是，以思果為例，你會不會認為學生在入門的階段，以那個作為基礎會比較穩固，等到中英文都有相當掌握之後，再進一步發揮，會比較穩妥一些？

張：作為基本功的練習，這些可能是有用的，但很多時候這些不是真能用得上。真正做翻譯有了一個明確的目的及讀者群，有的時候這些標準就用不上了。

單：照你這種目的論的方式來看，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



圖 3 張南峰教授翻譯研究專書。

資料來源：單德興教授。

譯的中國文學作品，有些人對照原文來看，就認為改動了許多。

張：我最近少看他的東西，之前看過他譯的《幹校六記》，和另一位漢學家相較，他已經很收斂了。澳洲的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比較 target-oriented（目標導向），葛浩文則是很多刪改，可是很多東西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特色，像是很多成語是直譯過去的。在西方漢學家裡他不算是採用 domesticating（歸化）的策略了。

單：所以說他是遊走在歸化跟異化之間，而希望達到他想像的最大的目的？

張：有時要看他為誰翻譯，他為中國的熊貓叢書翻譯的時候就比較原文導向，為外國的企鵝叢書（Penguin）翻譯的時候就比較譯文導向，有這樣比較細的差異。

單：我印象中你是唯一四次獲得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紀念獎的人。

張：應該是吧，我沒去數。別人頂多拿兩次吧！

單：那個獎的成立是為了紀念宋淇（林以亮）先生對於翻譯界的貢

獻，得獎的作品不單是該年度最好的學術論述，而且有一定的指標作用，是當時評審認為很具代表性的論文。

張：當時在香港翻譯研究剛起步，還沒多少人發表文章，報名參加的人大概不多，他們看中我的東西可能覺得是代表一種新的方向。

單：這四篇論文有中文也有英文。

張：三篇英文，一篇中文，現在看起來很粗糙。³

單：這表示你的功力又增長了。你剛提到在香港剛起步，但一般人印象中，香港是華人世界翻譯研究的領頭羊。

張：以前不是。香港起先是急起直追了幾年。1986年我剛出來教大學時，香港沒有人做翻譯理論研究，我們那時教翻譯的理論課和實踐課甚至都是用大陸的教科書。

單：大陸的教科書是不是還是依循傳統，要求忠實跟信達雅？

張：實踐方面幾乎全國用的教科書是統一的，採用《英漢翻譯教程》跟《漢英翻譯教程》這兩本。我們那時在香港城市理工大學設計翻譯課程的人也規定要用這些教科書，至於理論就用譚載喜編譯奈達的著作再加上英文原著。譚載喜寫的《西方翻譯簡史》，還有金隄與奈達合著的《論翻譯》（Jin Di and Eugene A. Nida, *On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 1984]），我們拿著當聖經一樣。當時香港是比大陸落後的。1987年在香港開翻譯研討會，我第一次接觸到臺灣的學者，他們在研究西方理論方面也領先我們，像是胡功澤介紹德國的翻譯理論，當時香港還沒有人看這些理論。到了九十年代香港教翻譯的人就開始接觸理論了。我們有天時地利，容易找到西方的資料，幾年之間香港的狀況改變得很快。

³ 四次得獎論文如下：（一）1999年，Chang, N. F. (1998). Politics and poetics in translation: Accounting for a Chinese version of 'Yes Prime Minister'. *The Translator*, 4(2), 249-272;（二）2000年，Chang, N. F. (1998). Faithfulness, manipulation, and ideology: A descriptive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radition.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6(2), 235-258（1999年出版）；（三）2002年，張南峰（2001）。從邊緣走向中心（？）：從多元系統論的角度看中國翻譯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外國語，4，61-69；（四）2003年，Chang, N. F. (2001). Polysystem theory: Its prospect as a framework for translation research. *Target*, 13(2), 317-332.

單：那跟前輩學者所打造的環境有沒有關係？陳德鴻教授接受我訪談的時候提到，他念書時香港沒有翻譯方面的正式課程，宋淇先在香港中文大學試著做，還創立了《譯叢》（*Renditions*）。不知道那種氣氛跟後來香港翻譯研究的發展有沒有關係？

張：我比他們再晚一輩，比陳德鴻晚了七、八年畢業，不知道當時的情形。

單：你跟陳德鴻教授共同編譯的《西方翻譯理論精選》（*Masterpieces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2000）具有相當的指標意義。

張：在那個歷史環境下，算是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使命。當初大陸很少接觸外面的東西，看得懂英文理論的人也不多，所以這些譯本對大陸有很大的影響。雖然一直沒在大陸正式出版，但的確有很多人引用，發揮了傳播的作用。

單：當初編譯這本書的動機如何？

張：我是被動的，由陳德鴻主動想到這個計畫，然後拿到資助，就請我跟他合作，完全是他的構想。

單：你們是怎麼挑文章的？

張：我們分工挑選，目的論、多元系統論是我挑的，後結構主義等是他挑的。我們每人熟悉一半，加起來就是很好的組合。

單：你們找了很多學者翻譯，各篇譯文之前都有說明文字，作為入門很方便，而且出版社很認真行銷，連在臺灣的我都接到出版社的贈書。

張：現在比較少人引用那本書，因為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原文了。我估計是 2010 年左右，或者在那之前，引用率下降了很多。大陸近年也出了一些西方理論的中譯本。我跟陳德鴻編譯這本書的時候，大陸學者應該還很少人有這個能力。

單：你跟陳德鴻共同編譯這本書之外，其實你還客串編輯了臺灣《中外文學》的「多元系統研究專輯」、香港《翻譯季刊》（*Translation Quarterly*）的專號「中國翻譯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專號」（“Special Issu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Past and Future”) 以及「翻譯與意識形態專號」(“Special Issue: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中外文學》的專號於 2001 年出版，當時為什麼會想到要編那個專號？

張：不是我主動的。

單：是臺灣方面找你的？

張：是。

單：是馬耀民嗎？

張：是，我都忘了他是直接找我，還是有中間人。其實我不認識他，好像是他主動提議出個這樣的專題。

單：那本書由你跟莊柔玉合編，是臺灣唯一有關多元系統研究的期刊專輯。我還記得裡面有人用相關理論研究金庸。

張：是香港城市大學的莫慧嫻博士，已經退休了。

單：《翻譯季刊》的兩個專號都在 2000 年出版，一個談「翻譯與意識形態」，一個談「中國翻譯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跟你的背景和興趣滿相關的。你說過自己是「中港混合體」，會不會因為這個緣故，讓你對翻譯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以及中國翻譯學或翻譯研究的建立特別關心？

張：其實是這樣的，當時一些相關的議題，特別是意識形態的話題，在大陸還沒什麼人敢談，然而在西方是熱潮，我就趁這個機會推動這個研究。

單：有沒有迴響？尤其是大陸方面。

張：迴響不大，因為大陸看不到香港這些期刊。

單：就出版跟意識形態而言，在大陸有些敏感的字眼要拿掉，晚近出版的尺度又緊縮了一些。

張：他們隨時改的。兩年前聽說，凡是涉及日本的研究都不能出版，就因為釣魚島的緣故。有人剛寫了一本書印出來，就在印刷廠裡擱著。

單：不是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嗎？

張：現在是不是解禁了，我不知道。我的《多元系統翻譯研究》提到「臺灣」，編輯曾經想改為「我國臺灣省」。

單：像我們中央研究院就不能出現全名，要用全名就得加引號，或縮寫為中研院，因為除了他們不能另有中央。

張：很霸道！

單：金聖華教授曾邀請楊憲益夫婦來香港中文大學，他還是香港翻譯學會的榮譽會士，你則是終生會員。我看過香港翻譯學會的出版品上所收錄的會員名單，終生會員的人數並不多。

張：那是我自願，若不想每年交錢，就交一筆錢成為終生會員，很便宜！

單：《翻譯季刊》就是學會的刊物，你除了投稿之外，至少幫著編過兩個專輯。

張：我現在愈來愈少參加這類活動了。

單：是的，畢竟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有限。回過頭來看香港翻譯的背景和建制，跟你當初念書時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你會怎麼從建制或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整個發展？

張：以前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學院的翻譯課程比較著重實踐，現在理論和翻譯史研究比較佔上風，也就是學術研究佔了上風。這種現象有好有不好。有些傳統的智慧就給我們丟掉了。老一輩翻譯家的功力現在沒有人傳承下去。思果、余光中、金聖華、劉紹銘，還有黃國彬、John Minford（閔福德），這些人的文字功力，現在沒有人趕得上。這是可惜的地方，可能潮流著重學術研究。當然老前輩們有他們的局限性，但我們著重理論這一套，其實也有另一種局限性。用張珮瑤的話來說，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知識。兩邊都能兼顧的其實也就是張珮瑤，不僅有翻譯理論和翻譯史的著述，中翻英也很優秀，可惜六十歲就逝世了。

單：是的，她的中翻英除了有關中國翻譯史的論述之外，還有與黎翠珍合作翻譯佛經的一些短故事，以及當代小說及戲劇。我與她結識於

2004年北京清華大學的翻譯會議，去（2014）年應邀為她的紀念文集《風箏不斷線》所寫的序，就是在嶺南大學這裡完稿的。⁴

張：香港很奇怪，對老一代的翻譯教師跟比較年輕的翻譯教師要求不同。前面提到的前輩們，主要是靠翻譯或創作得到學術的承認，很多都做了講座教授（Chair Professor）。但是在同一個時空裡，有些院校就不用這一套標準來要求年輕學者。香港的學術研究評鑒（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據說還是承認翻譯和創作的。但是，有大學的前任高層人士就說，必須發表論文，文學翻譯和創作只是錦上添花。

單：能不能反過來說，這是因為翻譯研究或翻譯學太成功了？

張：不知道！現在香港已經沒有翻譯學的講座教授了，一個都沒有。我們數下來，余光中、金聖華、劉紹銘、張珮瑤、黃國彬、閔福德，他們不是退了，就是走了。

單：Douglas Robinson（羅賓遜）呢？

張：他是英文系的，不是 Chair Professor of Translation。張隆溪是 Chair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一半是在比較文學。王宏志是 Professor of Humanities。沒有人有 Chair Professor of Translation 這個頭銜。⁵

單：嶺南大學翻譯系最近在全港學術評鑒中排名第一。拿你碩士班畢業在香港城市大學教翻譯的情況，和現在在嶺南的情況相較，差別在哪？

張：最大的不同就是，香港城市大學主要是語言學的方向，我離開那裏主要也是這個原因。城大整個部門基本上是語言學家在主導，當初有很多衝突，彼此不服氣。我批判語言學的翻譯研究途徑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因為那種觀點太狹窄了，把翻譯完全看成是語言對比的問題。嶺南的傳統比較著重文化與翻譯的關係，所以我就到嶺南來，在這

⁴ 〈翻譯研究的豐厚推手〉原刊於《風箏不斷線：張佩瑤教授譯學研究紀念集》，張旭、黎翠珍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頁4-10。後收錄於筆者《翻譯與評介》（臺北：書林，2016），頁195-204。

⁵ 三人分別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裡如魚得水。當然有一點遺憾就是我們這裡缺語言學的人，如果什麼學派都有，和平共存，那是最好的。

單：你在嶺南大學教了這麼多年翻譯，在所講授的課程中，除了專長的翻譯理論之外，也講授翻譯與幽默。你是怎麼教學生的？翻譯本身就不容易教，而幽默更難以解說的方式來處理。

張：有一半是教幽默作品的翻譯，另一半是教創作、欣賞和幽默理論。

單：幽默理論中外都有嗎？

張：基本上是外國的。他們的幽默研究有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三種途徑。華人世界的幽默研究不多，只有兩三本書。

單：我印象中臺大心理系多年前有一篇博士學位論文就是研究幽默。⁶

張：可能他們都得依靠西方理論，像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講過的那些東西。

單：學生一般反應如何？

張：學生給這門課的評分比不上我教的新聞翻譯。也許有些東西太難了。

單：因為新聞翻譯比較實用，容易印證？

張：可能是這樣。曾經有學生跟我辯論得很厲害，不太接受我對幽默的看法，因為東西方的幽默文化很不同。

單：能不能說說你對幽默的看法，以及學生沒辦法接受的原因？

張：基本上東西方幽默傳統不一樣。好比說，英文的笑話基本上有一個 punch line（妙句，笑點），這句出來之後笑話就結束了，不再講下去。中文則不同，有一半的笑話是在 punch line 之後還繼續講下去。或者中文的 punch line 有時候很長，把笑話很淺白地講出來。因此我要求學生中翻英的時候，要設法把 punch line 寫得含蓄一些、短一些，他

⁶ 陳學志（1991）。「幽默理解」的認知歷程（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臺北市。

們覺得很難，甚至不理解。英譯中的時候，他們有時會看不懂原文的 punch line。

單：就像我在英美看戲時那樣，悲劇還容易了解，喜劇則最難掌握，有時哄堂大笑，我卻笑不出來。

張：這裡牽涉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他們講的是他們文化裡的笑話，我們聽不懂；另一個就是太含蓄了。

單：你提到中西的不同傳統，有沒有讓學生看中國的《笑林廣記》和《世說新語》？

張：拿了幾個做例子，就是很淺白。

單：現在香港翻譯的生態如何？我在書店看到香港出的一些書，臺灣不一定會出。但也有香港朋友跟我說，有些書在香港不太會出，在臺灣才有可能。

張：我覺得臺灣出書比香港容易。香港地方太小，而且比較 practical（實際），寫書文化的生態不是太好。



圖 4 張南峰教授接受訪談的神情，桌上是他的譯作與翻譯研究專書。
資料來源：單德興教授。

單：其實臺灣出版界的情況並不是很樂觀，一方面全球圖書市場上實體書的銷售量普遍下跌；另一方面臺灣的人口只有兩千三百萬，圖書市場有限，學術出版的市場更小。

張：總比香港人多嘛！我當初考大學前自修英國文學。香港的制度是五年中學，加兩年預科，我念預科的時候就決定要報考英國文學，自己去買參考資料，完全沒有老師教，基本上就是依靠臺灣的書。香港當年有一家書店專門賣臺灣的書，教科書之類的，裡面就有一些介紹、批評英國文學的著作。有些是英國文學的譯本，好比說戲劇方面的，現在還記得的名字是顏元叔。

單：他是我臺大外文研究所的老師。

張：臺灣還出了一些解釋英國文學的參考書，好比說英國的詩，*The Rape of the Lock*，我看不懂原文就參考臺灣的版本，裡頭有註解。

單：還有一些小冊子可能跟香港有些關係，像是 *The Rape of the Lock* 那本小冊子，中譯名《秀髮劫》是我大四翻譯課的老師高天恩取的，他當時還是臺大外文所的研究生。

張：很精彩！

單：當時他們上李達三（John J. Deeney）教授的課，李老師教過我之後不久就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他先前在臺灣編譯了一系列英美文學導讀的小冊，跟今日世界出版社的作法有些相近，是用註解的方式，方便學生學習。

張：香港沒有這種教科書，很少中學會教英國文學，大學教英國文學卻把學生當成 native speaker（母語者）來教，因此在香港唸英國文學是很辛苦的。

單：我知道的原因是香港這邊是英國殖民地，因此老師認為英文應該都懂，可以直接讀原文，怎麼會要看翻譯。

張：而且他們沒有教很基本的文學技巧，以為學生已經懂了，其實根本就不懂。好比英詩的那些格律（meter）大學裡從來不教，你唸這個課就是應該懂了才來。我就讀臺灣的書自修，學英文詩韻之類的基本

知識。

單：你覺得兩岸三地就翻譯研究來講，香港的特色在哪兒？

張：香港處於東西文化之間，得天獨厚，而且大學資源比較好，要買什麼書都買得到，最早接觸到外國期刊。另一方面，香港老一代的翻譯家，像是宋淇、余光中、黃國彬、金聖華，他們的翻譯風格講究品質，譯得比較美、比較順。跟臺灣和大陸不同，大陸比較生硬，好像臺灣也是這樣，我看到的一些臺灣出版的英國文學的譯本都譯得很直。

單：這可能還不到翻譯策略的層次，也就是說譯者採用的翻譯策略是歸化還是異化，而是文字造詣的問題。

張：可惜我還沒看到你翻譯的《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七十年代我是看臺灣的譯本，很難看，我忘了譯者是誰。我念英國文學的時候也是靠這些譯本。還有《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也是看臺灣的譯本，也是譯得太硬了。

單：我們那時候認定的翻譯標竿有喬志高、姚克、夏濟安等人，他們幫今日世界出版社譯書，主張要先把原文消化，而且中英文造詣很高，再加上歸化的翻譯理念，於是譯出優良的作品。但是以今天大部分的譯者來說，就算想用很道地的中文表達，也未必有那種能力。

張：這是可惜的地方。

單：你出入於翻譯的理論與實踐之間，覺得兩者的關係如何？

張：圖理就說他的理論跟實踐沒有關係。他雖然不是討論怎麼做翻譯，但我覺得他的理論也有參考的作用。像是多元系統論起碼可以打破比較盲目的忠實這種觀念。

單：你透過多元系統論把文化的面向、甚至歷史的面向或脈絡也能帶進來。

張：從事翻譯的人如果有文化的意識是有幫助的，因為有些人太盲目了，像是忠實的觀念背後還是涉及價值觀，不是絕對的真理，所以做翻譯的人，如果不關注文化問題，就會很盲目。

單：回到翻譯策略本身，身為翻譯理論家，又有實務經驗，選擇翻

譯的又是幽默和雙關語，你如何看待歸化和異化，直譯和意譯？

張：我的老師們，像是黎翠珍，或已逝的黃兆傑，還有很多人，大都主張譯文要通順、要美，對我的影響很大。還有一點就是，這種觀點在整個中華文化裡，我不知道地位與影響怎麼樣，路數跟大陸是很不同的，跟主流意見很不同。可能到現在我還是比較接受大部分老師的說法。好比說，原文裡有雙關語，如果譯文裡沒有雙關語，那又幹嘛要譯呢！而譯文裡如果要有雙關語，必然離原文很遠。

單：所以在翻譯中處理幽默時，就必須達到幽默的效果。

張：必須有 license（自由度）去違反原文字面上的東西。因此為了雙關語，我把上下文都改了，不然接不上。

單：你那篇談自己翻譯《好的，首相》的中文論文，還特地把原文跟譯文對照，來說明自己為什麼這麼譯？

張：現在覺得當時太過分了。

單：當時說不定自認是神來之筆？

張：哈哈！可能是這樣！

單：你提到大陸翻譯比較不同。他們有兩個不同的翻譯方式，錢鍾書主張要「化」，魯迅則主張直譯。在實做方面是不是魯迅比較占上風？

張：看來是，因為魯迅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所以他那一派一直佔上風。*Yes Prime Minister* 最近在大陸又出了一個譯本，雙關語全都沒了，而是用腳註來說明原文的雙關語。

單：讀起來就沒那種味道。

張：我覺得讀起來就沒什麼意思。

單：書名也是《好的，首相》？

張：我忘了是什麼。應該不是「好的」，而是「是的」。最直接！

單：我記得你文章裡提到，原書有兩章不是用“*Yes, Prime Minister*”這句話作結束，所以你在譯文中也補上了。

張：因為電視劇的每一集都是以“*Yes, Prime Minister*”結束，不知道為什麼出書的時候改掉了，我是參照電視劇重新寫了一個結尾。

單：工程很浩大，等於是一種再創作了。

張：有一些吧！

單：劉紹銘有個說法，「翻譯是借來的生命」，也就是說，有些人有創作的欲望，但不一定能夠表達得那麼好，於是藉著翻譯別人的作品來發揮自己的創意。

張：這句話說得很好。

單：你覺得適用在自己身上嗎？

張：也可以。

單：尤其像翻譯幽默更難處理，說不定比自己說笑話還困難。

張：有容易的，也有困難的。說不定我有那個文字技巧，卻沒有構思整個故事的技巧，是吧？

單：根據自己的實務經驗，或者身為翻譯研究學者，你如何看待譯者的職責？

張：譯者基本上還是受制於翻譯的目的。當然譯者可以是獨立的，不過總是有個目的在。我很接受目的論，主張譯者的地位或角色是從屬於目的。有些理論家的說法就比較片面，好比有人主張譯者必須隱身，有人主張必須 empower（培力）譯者。這些說法我覺得都很片面。

單：不管譯者是培力還是隱身，但往往他們的地位相當低落。比方說，在學術界翻譯一本書，未必會有太大的學術評價，即使產生的影響不容小覷。

張：是，看來現代社會的確是這樣，大家都把翻譯看得太容易了。很多人都不知道翻譯原來那麼難，會遭遇多大的挑戰等等，而小看了翻譯。再加上有些人是因為小看了翻譯工作，才來做翻譯，結果就把它做得確好像很容易，以為查查字典就可以去翻譯，結果把這個行業搞糟了，大家都搶著去翻，自己兩種語文的功力都不是那麼好，出版社也替他出書，結果愈做愈糟，惡性循環。

單：像是那種翻翻字典就翻譯的人將來很容易就會被 machine translation（機器翻譯）取代了。

張：有些人對機器翻譯很樂觀，以為真的能做。

單：有趣的是，我在臺灣認識一些從事資訊工程的電腦專家，他們因為深知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的局限，反而比較保留，不像外行人那樣樂觀。

張：在城大當時也是有一個爭論，想要設計一個電腦翻譯的課程，要教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計算語言學）之類的，認為電腦就能取代人。

單：回顧起來，你會如何自我定位跟評價？

張：嘿嘿嘿！我覺得自己最大的貢獻就是把這些西方的翻譯理論引進了中國文化裡，臺灣不算，因為臺灣是另一個國家！哈哈！像是大陸和香港的目的論和多元系統論，這些都是我第一個引進來的。另一方面就是我把多元系統論修補了一下，這算是個小小的貢獻。我現在關注的問題就不限於翻譯了，而是更大的問題。好比說，中國文化的自我形象就不是直接的翻譯問題。我把自我形象的概念用在中國文化輸出的問題，好比設立孔子學院，增強軟實力，大媽到莫斯科紅場去跳廣場舞這類現象，都是相通的文化問題。

單：會不會跟晚近所謂的中國崛起，或者說中國夢、甚至一帶一路相關？

張：是啊！我愈來愈關注這些比較大的語境。其實這些都是暴發戶心態，突然間非常心急，想得到世界的接受，提高在世界上的地位，實在是太心急了！

單：以臺灣經驗為例，經濟愈來愈好，政治會愈來愈寬鬆，但大陸剛好相反！

張：大陸打破了這個定律！很奇怪！是吧？

單：這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吧！

張：大陸有寬鬆的地方，但把底線控制得很嚴。在那個底線之上，以前不能說的現在能說，即使是在很公開的場合說都無所謂。其實政府怎麼做我並不奇怪，可是民間的作法，好比說知識界自願接受官方這種

底線跟政策，我覺得很失望。

單：這可能牽涉到自我審查的問題。

張：他們有些人不是被迫，而是很自動地接受官方的立場。好比我說中國文化的自我形象太高，有人聽了很不高興。

單：就大環境來說，據我所知，晚近在出版方面比較緊縮，原先可以通過的書現在要重新審批。另一方面就是出版社比較現實的考量，萬一出的書讓人告到官裡、甚至查禁，對出版社來說是名譽和金錢的雙重損失。所以編輯和出版社會去想像可能的情況，因而自我設限。

張：被動接受某些約束的情況也是有，不過我見到不少人是很主動地去施行這種約束，而且是完全接受，這是令我失望的地方。像是我說中國文化的輸出政策太 aggressive（過份進取），也提到中國政府對內、對臺灣、香港都是實行硬實力政策，那怎麼能對西方提高軟實力？我主張內外必須相同，同時實行軟實力政策，他們就很反感。上個月在英國開會我講到這些話，事後有大陸學生反應說：你們香港人全是這樣看我們的嗎？

單：回到最基本的問題，你是如何看待翻譯的性質與作用？

張：我現在很少考慮這個問題。我的興趣已經不在翻譯上，而是從翻譯現象引起我對整個文化的關注，平時思考的問題都在那方面，像是新聞自由、學術自由這些議題。

單：這就回到〈我的中港心〉那篇文章，以及你在網路和臉書上發表的言論，也就是回到了更大的人文環境，或自由氣氛的塑造跟維持。

張：如果沒有好的、比較自由的環境，再講什麼翻譯或翻譯研究都沒用，因為大環境不允許你做。我比較關注的是大問題。我現在給自己的定位就像是一個 academic/political dissident（學術／政治異議人士），愈來愈往這個方向走，主要是出於自己的選擇。好比說，陳德鴻最近幾年在做日本漫畫研究，他說以前必須提出研究成果，現在快退休了，就依照自己的興趣。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以前是半被迫地去做某些研究，寫某些論文，現在則完全是有感而發地去做文章，想到什麼要說就寫，

所以最近就到處得罪人，一些西方的期刊和研討會都把我拒諸門外——以前沒有這樣給人回絕過。

單：西方的學術不是應該很開放的嗎？

張：我批判他們的後殖民主義，因為他們在鼓勵中國文化的保守跟獨裁，這讓他們不高興，所以最近的文章有些發表不了，就算能發表也要經過很艱苦的辯論。結果他們不願意發表，有時又覺得不能不發表，可是那些評審對我的態度非常尖酸刻薄。我現在發表文章比以前困難，花很多時間寫出來的東西沒人接受，我也無所謂，反正快退休了。

單：你可能比我年長一點，我是 1955 年出生的。

張：我 1952 年出生。

單：因為年紀相近，所以你剛講的我心有戚戚焉，早就拿到長聘了，應該從心所欲，套用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說法，你是 speaking truth to power（向權勢說真話），另外按照薩依德從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那邊來的啟發，晚期風格（late style）未必像以往那麼講求 refined（精巧雅緻），反而是更真實的呈現。

張：以前寫這些文章都有一些 compromise（妥協），特別是在大陸發表的時候，有些話不能說得那麼直，有時要按照他們的要求，主動做一些調整或淡化，也是一種自我審查。

單：你覺得兩岸三地的翻譯研究情況如何？

張：對臺灣我不太了解，但大陸是在進步之中，而且進步得很快，可是還是比不上香港，主要受到語言與文化的局限，很少能用英文發表。大陸學者常說要走出去，但英文不夠好，寫不出文章來，這是很可惜的。他們有些研究其實做得不錯，但就是走不到世界上去。曾經有個別學者要我替他們改英文，但我沒有那個時間和能力。

單：香港的翻譯系有不少大陸來的研究生。

張：這些年輕一代非常 promising（前途看好）。臺灣學生我們很少接觸或交流，也是一個遺憾。臺灣很少學生來香港念書，不知道是香港政府的政策，還是什麼原因。交流生都是大陸來的。這兩年嶺南請你

來兼任我也很高興，給我們多一個機會跟臺灣接觸。

單：我希望多少不負所託。最後一個問題：你覺得訪談如何？

張：很好哇！有一個機會總結自己，要不然我不會去想自己做過什麼！哈哈哈！